



微观视域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逻辑与策略

王 琼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杭州 311112)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宏观话语形式逐渐出现以利益与绩效合法性论证的稳定性问题、制度的刚性结构固化效应、领导权工作机制创新不足为表征内卷化风险。通过“相对剥夺感”“合法性认同的内在冲突”“个体关联性压力”等微观层面范畴的分析,提出了以个体利益的整体性实现逻辑为起点、“意义之网”的文化路径为机制、个体的社会主体意识为基础的微观话语体系建构模式,并建议实施获得感、认同的象征性压力、以人中心科学化传播策略等的话语体系构建策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微观分析视域。

关键词: 意识形态;话语形式;微观视域;建构逻辑;策略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08-0406-07

The construction logic and strategy of socialist ideological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WANG Qi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31111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 involution risk has gradually emerged to the ideological macro-discourse for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tability problem of benefit and performance legality argumentation, the solidification effect of rigid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and the lacking of innovation of leadership work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e micro-level analysi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feeling", "internal conflict of legality recognition", "relevance pressure on individual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construction model of the micro-discourse system which takes the logic of the holistic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as the start, the cultural path of "webs of significance" as the mechanism and the individual's social subject consciousness as the found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the sense of gaining, symbolic pressure of identification, and human-centered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nd provide a micro-analysis perspective on the socialist ideology discours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ideology; discourse form; micro perspective; constructive logic; strategy

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社会转型压力以及西方社会冷战思维、话语霸权的双重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功能有待于进一步增强。郝保权等^[1]认为:“建设有吸引力、凝聚力、引领力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依然繁重艰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研究主要围绕价值引导、内涵界定、特

征概括、功能叙述、建设经验等宏观角度和领域展开,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开展研究。借鉴汤普森(John B. Thompson)有关意识形态的大众传媒研究方法,刘少杰^[2]认为个体与群体在意识形态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吴学琴^[3]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媒介话语已经从理论形态下沉到日常生活领域;马俊领

收稿日期:2020-03-24

作者简介:王 琼(1980—),女,浙江温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研究。

等^[4]认为埃尔斯特(Jon Elster)以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为原则对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进行了重建,对于从微观的角度研究相关问题颇具启发意义;林滨等^[5]从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文化体系“深描”路径和齐泽克(Slavoj Zizek)的意识形态幻象理论出发,提出了对意识形态运行的机制化理解。相关研究运用传播学、心理学、文化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提供了以社会个体和群体为关注点的意识形态微观化研究视角。但总体而言,与宏观研究路径对应的微观意识形态系统化模式研究较少。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系列微观化分析范式,多角度探讨与社会个体、群体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探求与分析对应的微观意识形态建构模式和路径具有积极意义。

一、宏观话语形式的内卷化风险

通过强调人民利益、建设制度,把握社会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充分发挥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正向效用,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生动图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在面对转型社会压力时,单一强调意识形态宏观化建设维度而忽视微观建设的意识形态建构策略,将会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不同程度的“内卷化”^[6]的风险。内卷化概念^①作为描述特定领域发展状态的研究范式被广泛地运用,在分析宏观意识形态发展状态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阐释:一是宏观意识形态发展在达到模式形态后,系统发展要素被持续吸收到内部,却无法达到稳定状态;二是由于系统内部的不断复杂化,又无法实现外部扩张,将会形成刚性结构并排斥变化发展;三是继续加大对系统内投入,却出现类似“边际效益递减”效应。

(一)“利益”与绩效合法性论证的稳定性问题

“利益”是理解意识形态的重要概念,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的作用。在反对殖民统治追求民族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它曾被融入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话语体系,支撑政治合法性的实现和民族国家身份的构建。新中国建立初期,这一意识形态建构倾向的强势延续抑制了经济和生产体制领域意识形态内涵发展的诉求,出现了忽视个体利益的意识形态空泛化现象。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既有的社会动员和管理秩序薄弱,意识形态内涵的

空泛化、绝对化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理解体系的僵化,对社会结构和生产建设活动造成了破坏。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建设从“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辩证统一的角度,探索“利益”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底层建构形式。同时,这一建构过程强调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个体利益的承认程度有所区别,即个人利益具有阶段性实现的特点。邓小平指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7]利益的获得必须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从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角度开展的合法性论证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重要基础,发展绩效弱化时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也会随之受到影响。随着利益内涵的复杂化和实现手段的多样化,当前绩效来源已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扩展至政治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绩效论证的形式也不断多样化。但当前绩效概念仍主要与客观化、整体性利益概念相关。随着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以及相关绩效来源的不断拓展,宏观意识形态发展模式若囿于利益的整体性、客观化的表达,其稳定状况也将受到挑战。正如埃尔斯特在政治行为的意向性解释所提到的:“集体活动发生在……群体为增进其利益而活动的时候,对集体活动的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提供这种行为的微观基础,即根据进入了分有这个集体的那些个人的动机的欲望和信念来解释它。”^[8]

(二)“制度”的刚性结构固化效应

宏观意识形态内卷化风险的另一个重要表征为制度内部刚性模式结构的出现。面对利益分化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意识形态宏观话语形式的中观层次构建要求意识形态能够表征和反应核心利益,并表现为以利益生成性的实现机制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建构过程。在制度设计领域体现为运用制度建构对社会的结构化冲突起到弥合张力,重建秩序的作用。在实践领域体现为制度设计过程中以容纳利益框架为基准,倡导对社会领域的维护和尊重,不断完善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通过制度完善弥

^① 虽然研究者对内卷化概念运用是否切合概念最初含义本身存在不同意见,但内卷化概念已被运用于经济发展、国家政权等领域的分析,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的现象,它往往与发展概念相连。文中对于内卷化的三个层次解释:第一、二层次解释主要来自格尔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中的定义,第三层次的解释来自于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合各种类型、各种主体间的利益间的紧张关系,进而维护整体的国家利益。通过制度来归置意识形态分化,划定利益的边界倡导秩序的意义,完成了社会结构层面的制度框架建设形式,它以经济绩效为基础,以制度安排为条件的论证形式,是与意识形态的框架同源同构型的结构形式。它浇筑了利益冲突的隔断墙,强化了意识形态类国家机器的刚性结构特征。

这一结构特征在将规范和秩序转换为政治认同的过程中起到了运行机制的作用,较好地发挥了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随着新时代利益结构层次的不断复杂化,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将持续强化,对于不同层次利益诉求响应的全面化、即时化成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面对这种复杂性,宏观意识形态内部刚性结构有进一步固化的倾向,较为明显的特征是包容性、批判性、灵活性不足,在面对以遮蔽个人主体性为特征的二元化话语形式时,会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无法适时调整并提供话语支撑。

(三)“领导权”的工作机制创新不足

“领导权”通常在意识形态工作层面和关联性外部压力下的斗争策略层面被提及,处于意识形态宏观建构表层,与意识形态工作水平相关。近年来,在加强意识形态主流理论的研究方面持续投入并采取适当的宣传策略,提升社会主体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程度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仍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不够稳固,对其它思潮的引领不够有力”^[9],呈现出“边际性效益递减”效应。列宁曾基于阶级斗争过程中掌握领导权的经验,就特定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必要性、意义、主体和媒介进行了全面论述,并开创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体系作用于个体的外部机制的独特理解形式和实质化的工作模式,阐明了意识形态作用于微观个体的机制性认识进程,在当前环境下仍是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理论依据。领导权理论在工作机制层面与阶级概念直接相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的内涵与实质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10]在不同阶级意识形态对抗过程中,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增强了个体所感受的意识形态关联压力,这种关联压力是“自我”边界确定的重要依据,也使得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后,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发生转变,将阶级斗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场域也发生了变化,个体外部关联压力作用于个体的

方式也随之变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工作局限于在外在关联压力的工作策略不利于领导权工作机制的创新。

二、微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论证范畴

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宏观建构的内卷化问题出发,探究这一系列问题背后所潜藏的建构性发展制约因素,并形成基于微观视野的分析范畴,可为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科学化水平理清思路。

(一)相对剥夺感

利益的合法性论证问题将利益认定为外在于意识形态主体的客观性的判断,在实践层面较难就个体利益的实现状况及其主观感知进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评估。在基于经济绩效的利益的叙述逻辑相对弱化的情况下,面对利益分化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个体“相对剥夺感”^[11]无疑是需要正视的现象,它与利益概念直接相关,但又不同于利益概念是一种整体性、客观化、可量化评估的衡量标准,而是以个体心理为基础的感受性指标。与“相对剥夺感”关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利益维度应在关注物质利益等客观性指标的同时,重视公平正义、文化生态等方面指标。同时,应关注“相对性”这一与个体心理体验相关的主观指标,即相对于整体、相对于过去的利益提升方面的考察。否则将不利于利益内部的统一性逻辑,并使建立在“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统一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宏观话语体系“利益”维度的发展受到限制。

(二)合法性认同内在冲突

发挥意识形态在思想和价值领域的建构作用,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即建立“合法化论证机制”以应对个体性无组织力量所带来的压力,发挥其整合功能,消除意识形态刚性结构特征在利益分化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必然选择。它常规性地通过运用合法性论证资源以倡导共同的社会价值通来实现。常见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资源主要包括以公民道德集体情感为代表的集体要素和以原生性情感为载体的历史化宿命观资源两类。这两类资源在合法性论证过程中被期待为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在实践领域这两类资源之间时常呈现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并主要表现为两种论证模式:一种是以公民道德情感等为基础,围绕公民价值观和行为规则的一致性开展的建构主义论证模式;另一种则是个体或者小范围个体的联合为重点,强调族群的特殊性和行为规则的多样性的原生主义论证模式。在迈向现代

化的过程中,制度作为合法性论证过程中的价值共建形式,被期待表现为原生主义或者建构主义的同向共建,但就微观个体而言,原生主义的要素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而公民道德情感需要通过良好社会秩序的实践和培养。

因此,在外部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有可能表现为原生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紧张冲突,而这种紧张冲突的形势一旦形成,将深度强化原生主义论证,在社会领域出现二元式的话语形式。

(三)个体关联性压力

个体关联性压力是个体感受并接受意识形态影响的重要因素,包括外部关联压力和内部关联压力。其中意识形态领导权长期运用外部灌输化的工作机制,表明外部关联压力在个体的社会主体意识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形成的社会基础包括理论论证、制度性竞争、舆论传播等。在社会主义事业尚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矛盾将主要以两种制度竞争方式呈现,在外部直接作用于个体的阶级斗争外部压力已转变为宏观性的整体外部压力。以灌输为主要工作机制的意识形态形式作用于个体关联压力亦大幅减弱。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增强,但是多元化思潮对于社会领域意识形态的冲击,仍然要求重视领导权问题。与社会关联的个体,由于受到竞争性社会思潮的影响,其外部关联压力将进一步减弱。而个体关联的内部压力主要依赖于场景化和特定社群的生活方式,随着转型时期消费主义的盛行,出现了“现代性痼疾——致命的生命感觉的萎缩”^[12],消费主义、生活场景缺失、社会结构调整而造成的个体归属感缺失,传统文化断层造成的文化认同不确定性,逐渐消解了置于个体之上的内生性关联压力。这种内外部关联压力与个体的主体意识相关,随着内外部关联压力的共同减弱,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和批判功能也将随之减弱,相应地表现为个体意识形态的两种倾向:一是对于社会组织机构和社会事务的疏离;二是二元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这两种取向将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水平。

三、微观话语体系论证与建构逻辑

微观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基础范畴的建立为其逻辑内涵分析夯实了基础。在这一系列基础范畴之上,通过对比分析路径,建立包括底层逻辑、运行机制和价值基础等三大核心要素在内的意识形态微观话语论证逻辑,可为突破宏观话语体系内卷化趋势提供分析模式。

(一)逻辑起点:个体利益的整体性实现逻辑

与利益概念在意识形态宏观话语形式中作为逻辑结构的起点相比,微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结构基础可归纳为个体利益的整体性实现逻辑。“物质利益难题”是促使马克思对理性态度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13],对“物质利益”的深入解读使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源于资本主义“国家逻辑”的内在矛盾,以抽象的人性代替个体利益,以抽象的理性国家来掩盖市民社会的存在。“把人和人联系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14]资产阶级国家形式并非理性实体,而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与资本主义个体利益的实现逻辑的虚假性相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从个体利益的实现逻辑出发,其首要前提是通过摒弃“粗陋的共产主义”^①以及对阶级斗争的偏差性解释,形成个体利益的承认及对“利益”内涵的深入理解。在马克思看来,“粗陋的共产主义”问题在于“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15]。社会主义阶段正是对私有财产的不断扬弃的过程,这种扬弃不以私人占有为依据而以个人对于整体性的占有为依据。这种整体性的占有并不排斥个体的利益,也并非资本主义所理解的单纯个体的利益结合的机械决定论,而是个体的利益获得整体性实现,它建立在“个人利益”相对于“整体利益”的实现逻辑的基础之上,包括整体性的实现逻辑和实现路径。实现逻辑围绕个体利益、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全人类这一逻辑理路展开,强调阶级斗争是个体利益实现的逻辑起点。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无产阶级的历史胜利使得“阶级斗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全球化的视野中理解。随着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个体利益将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其实现路径表现为多层次、渐进性的过程,即“利益”内涵的从单纯的物质层面跃迁为包括物质在内的全方位利益,从客观到扩展为囊括主客观在内的概念范畴。

(二)运行机制:“意义之网”的文化路径

与制度在宏观话语体系中的层次理解相对应,微观话语形式下的“意义之网”构建则体现为对合法性论述内在矛盾的机制化解读。宏观话语形式下基

^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批判过与“粗陋的平均主义”相关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

于制度设计和价值导向的合法化论证有助于发挥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但制度的刚性结构固化效应无法为意识形态动态运行机制提供认识,诉诸于公民道德情感和原生性情感的论证形式则表现为从结果到原因分析模式,两者的共同缺点在于:“没有认真地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互动的符号体系——当作互相影响的意义模式——来检验。”^{[16]247}

在民族国家已经建成的历史阶段,强烈情感归于平静而制度框架已然形成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需要丰富意识形态的框架体系的内容,建立具备良好的凝聚功能的意识形态话语模式。该话语模式应建立在维持两种类型合法性论证资源——原生主义和建构主义资源的动态平衡基础之上。它不能简单地依靠挤压原生主义要素而使得建构主义要素得以扩展,而是要主动将原生要素织入现代政治的织物之中,使原生要素与当前的公民秩序协调起来,即将“不满”导入到一个恰当的政治形式之中,使原生要素变得“驯化”的过程。以原生主义要素(包括族群、语言、宗教、习俗、仪式等)为经线,以现代社会公民社会要求为纬线,在两者冲突和互相强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一个个纽结点,织就“意义之网”的动态过程。该机制通过对个体融入该意义之网的过程性解释,强调原生主义要素作为公民社会的底色使个体“归属和存在方式的多重性”得以保留,即“允许一个人继续公开要求根据其熟悉的群体独特性的象征符号承认他的存在和重要性”^{[16]364}。意义之网绝非文化的符号的简单描述和论证,更非将文化作为一种原因来理解,而是对事件和现象的理解可通过清晰描述的脉络。这种文化的“深描”路径所织就的意义之网不仅悬置于社会之上,亦悬置于个体之上,它为微观意识形态话语形式建构提供了环境作用于个体的机制性认识视角。

(三)价值基础:个体的社会主体意识

与宏观意识形态领导权维度相对应,微观话语形式下个体的社会主体意识主要表现个体在公共领域所展现的主体化的精神态度和思想习惯,对理性叙事的把握能力以及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等。主体化的精神态度和思想习惯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机制层面内化于个体并获得其稳定性的关键。社会个体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共同生活形成共识,并在不断的实践中通过申明和强化这一共识,从而获得积极的精神态度,形成独特的主体化思想习惯。

对理性叙事的把握能力是指个体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把握依赖对其共享性和经验的传承。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伴随着向共产主义迈进过程而实现的历史,这种历史摒弃事件、记忆和现实的实证性的理性演绎形式,无法直接作用于个体,要通过个体对于整体性的理性叙事的把握。它既要求在当前资本全球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防止个体的“理性相关的原则”被物的概念所遮蔽,更要在整体化理性叙事能力弱化情况下,依赖个体的非理性的信任、情感去把握这一叙事过程。个体关联性外部压力缺失的条件下,宏观话语形式建构方式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并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绝对性特征,以及单向化信息传播特点。而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建立在对宏观话语形式的理性、世俗、开放化的理解形式之上,建立在对于个体利益的整体性实现逻辑的理性化理解之上,并被嵌入特定的文化结构之中,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体将为意识形态建构提供坚实基础。

四、微观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策略

在微观话语体系论证逻辑的基础上,建立微观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努力克服宏观意识形态内卷化倾向,将有助于意识形态的内生性的发展,该话语体系的构建策略包括:

(一)建立以“获得感”为基础的衡量指标体系

在利益的整体性实现逻辑的基础之上,“获得感”是这一逻辑的具体体现,它是“多元利益主体(个体、群体、组织)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在微观意义上具体生动地显示着社会发展的进程”^[17]。它有助于准确把握利益和社会的分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微观领域的构建策略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在对个体利益的承认的基础之上,“获得感”是个体利益的整体性实现逻辑的重要连接点,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分水岭。同时“获得感”概念囊括了利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提供了衡量个体与整体性利益统一的评估标准,明确利益维度的非简单物质化评判的衡量指标体系,为客观上把握和理解个体利益实现的历史性和层次性逻辑,并最终实现个体对于利益内部辩证关系的理解提供了基础。相对于“相对剥夺感”,“获得感”是一个相对积极的概念,是对意识形态利益维度“相对剥夺感”从建构性角度做出的正面回应,有助于从纵向和横向获得感的维度来克服“相对剥夺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建立以“获得感”为基础的衡量指标体系是建设微观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策略基础。

(二) 形成认同的象征性压力

合法性认同的内在矛盾及其动态化的建构过程决定了合法性论证必须建立在对既定的文化脉络和文化机制的建设基础之上, 主要依赖象征性外部压力和内生性共享文化。其中象征性外部压力与“想象的共同体”不同, 文化机制作为意义形式体系作用于微观个体的形式不仅仅是心理认同, 必须摒弃整体性的、抽象划一的公民性道德情感提倡, 促进把握文化脉络基础上的想象力形成。“由于象征形式现在流通在多种多样背景之下, 这些背景在空间(和时间)上相离遥远, 结构方式不同, 而且象征形式在其中可能被解释、吸收、讨论或争议得无法被主要传播者所完全预计或控制。”^[18] 所以, 需要“增加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透明度, 加大那些能够强化想象者捕捉欲望的外部压力, 以刺激和深化想象者对国家的认知与情感”^[19]。而建立内生性的共享文化, 即通过剥离传统文化中等级主义观念, 运用各类传统文化符号, 在尊重特定民族心理基础和文化生活模式的基础上, 通过各类活动、仪式、事件将其纳入现代社会的公民文化之中, 营造个体对于共同生活的秩序感和归属感。在外部压力和内生性共享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共享的“自我”, 开展微观意识形态建构, 意识到“自我”与“他者”的区别, 而非两者的对立, 进而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包容力和灵活性, 是微观意识形态构建的实施路径。

(三) 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化传播策略

在现代化语境之下, 个体的主体性思维能力和非理性的情感共鸣能力是填补个体与意识形态间缝隙的关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价值依归, 首先要求拒绝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崇高理念去崇拜, 强调恢复哲学最自觉的理解和批判的本性, 并赋予个体的崇高价值体验。它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体生命体验为核心, 能使得个体生命体验与社会主义文化结构相互交融, 并与大众的传播形式形成一种共契传播策略之上, 通过分析传媒主体机构特点来分析意识形态, “以事为中心的研究领域拓展至以人为中心的领域”^[20]。分析人是如何与事相连, 不能就传播机构和传播结构本身来开展研究, 把人设想为理性的、抽象的主体, 要强调人作为非组织化的个体具有非理性的特点, 做到传播的内容必须能实现传播者与信息获得者之间的互动, 以及由此形成的互动结构, 并形成对这种互动结构科学化认知, 形成系统化的科学传播策略, 进而形成工作机制, 实现微观意识形态构建水平的提升。

五、结 语

本文从分析宏观话语形式的层级结构以及相应的内卷化现象入手, 阐述以个体利益的整体性实现逻辑为底层逻辑、以意义之网的文化路径为运行机制、以个体的社会主体意识为价值基础的微观话语体系论证逻辑, 有助于全方位了解意识形态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为建立起与宏观话语体系层级结构相辅相成的微观话语体系奠定基础。在提出该论证逻辑基础之上, 本文进一步提出以“获得感”为基础的衡量指标体系、形成认同的象征性压力、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化传播策略, 提供了微观视域下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策略。受科技进步和全球化潮流的影响, 意识形态的作用和传播机制的变化还在继续, 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从社会主义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实践出发, 运用文化学、传播学、心理学和现象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开展交叉性、专题性的策略研究和个案研究则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 [1] 郝保权, 陶惠敏.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高峰论坛综述[J]. 科学社会主义, 2019(6): 158-160.
- [2] 刘少杰.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62-69.
- [3] 吴学琴. 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性及其建设[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1): 116-123.
- [4] 马俊领, 刘卓红. 意识形态形成的思维机制: 论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建[J]. 社会科学家, 2008(10): 23-25.
- [5] 林滨, 曹莉莉. 意识形态空间化的机制与建构[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1): 32-37.
- [6] Geertz C.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51.
- [8] 埃尔斯特, 张一兵, 刘颖. 理解马克思[J]. 国外社会科学, 1988(9): 43-44.
- [9] 李冉. 谁之主流 何以主流: 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研判与建设愿景[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29(5): 84-89.
- [10] 郑永廷, 任志锋.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研究[J]. 教学与研究, 2013(7): 46-51.
- [11] Robert G T. Why Men Rebel[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46-56.

- [12] 刘小枫. 金钱·性别·生活感觉: 纪念西美尔《货币哲学》问世一百周年[J]. 开放时代, 2000(5): 19-26.
- [13] 徐苗, 刘同舫. 对理性从坚定到怀疑:《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的前后[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9(1): 20-27.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439.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97.
- [16]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江苏: 译林出版社, 2014.
- [17] 王浦劬, 季程远.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 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1): 6-12.
- [18] 王海洲. 想象力的捕捉: 国家象征认同困境的政治现象学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18(6): 16-25.
- [19] 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高铧, 等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289.
- [20] 姜红. 新媒介形态下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的转型[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1): 16-20.

(责任编辑: 王艳娟)